1999 年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

一　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1999 年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学术争鸣非常激烈。《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主要经济学刊物登载了大量有关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的文章，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如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第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问题逐一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需要寻找基础理论层面的指导。政治经济学作为各门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再度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第二，与应用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滞后，原有的理论难以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这种不适应性，经过 20 年的累积，目前已显得十分突出。

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学科改造的迫切性

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滞后表现的担忧情绪日渐明显。谷书堂撰文指出：从总体上讲，经济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一方面，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主体上仍受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思维方式方法的束缚，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徘徊，理论研究对实践总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尚难做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

负责人：王振中（修、定稿）；协调人：周济；成员：胡家勇（执笔政治经济学部分）、袁钢明（执笔宏观经济学部分）、刘小玄（执笔微观经济学部分）、董志凯（执笔中国现代经济史部分）、陈争平（执笔中国近代经济史部分）、李根蟠（执笔中国古代经济史部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介绍阶段，也难以应付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的现象。

晏智杰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世界天翻地覆的变革，到90年代，终于使政治经济学中原先相对来说最稳定的以马克思《资本论》为蓝本的资本主义部分也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的深刻革命，其科学价值是空前的，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引人瞩目和不容怀疑，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可取和有害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否定市场经济，但现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正是这种经济体制；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应当实行计划经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行不通的。”

胡培兆、程恩富谈到了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在高校，政治经济学往往被当作政治课来讲授。近几年，各种西方经济学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发生动摇，学术价值明显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向市场经济推进使西方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学生的选择亦使传统政治经济学受到冷落。从科研队伍来看，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实力锐减，很多原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纷纷转到应用学科或西方经济学领域。学术刊物也提供了一种激励，诱导科研人员把注意力转向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框架来分析现实问题，应用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兴趣大大下降了。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信心。蒋学模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危机的看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面临危机，而且正由于不断吸收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实践经验丰富了自己，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二）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提出设想

鉴于传统体制下政治经济学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改革以来很多学者不太愿意在“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二字。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王振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二字，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而且具有实质意义。首先，政治经济学研究脱离不了“政

治”，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概莫能外；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价值判断。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无阶段性”、“无国界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晏智杰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名称之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这两个名词虽然有一定区别，但绝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政治经济学未必就只能用来指称一些学者心目中那种具有无产阶级党性和阶级性的经济学；反过来，经济学也不见得就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种一般的纯粹的实证的经济学。

中国理论经济学究竟应当向何处去？谷书堂认为，最佳选择是转变理论研究的中心和培育新的理论增长点，而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经验（也包括挫折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本源。但实现经济学的变革则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暴露程度、理论积累深度。目前，这三个基本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飞跃还要走很长的路。

很多学者认为，重建政治经济学需要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邓小平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位置。

晏智杰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容置疑，但教条式地对待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研究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列宁研究的是垄断资本主义，都没有涉及现代资本主义，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研究方法看，主要用的是抽象方法，注意普遍规律的总结，但抽象方法有其脱离实际的一面；从研究任务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主要课题是变革生产关系，而当今面临的则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理论在重建政治经济学时具有指导意义。许多学者撰文指出，在当今条件下，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和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因为邓小平理论包括了一系列基本原理和理论的创新。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包括：国情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经济发展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等。张雷声认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为全面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界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积极吸收，反对照搬。谷书堂认为，应积极务实地利用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包括西方经济理论中一切符合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思想。王振中认为：“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论点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或‘裁剪’中国经

济。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仍需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别国的大师们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卫兴华认为，如同马克思的某些具体原理和论断不能照搬一样，“西方经济学（不管是哪一种流派）也不能照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殊历史与文化，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都会言不及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毕竟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三）对一些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解决深层次问题需要基本理论的创新。最近几年，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重大理论问题逐一浮出水面，经济理论研究也进入攻坚阶段，政治经济学由于其学科地位而成为主战场。

劳动价值理论是争论的热点之一。胡培兆认为，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目的是要最终导出剥夺剥夺者的结论，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服务。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为标准，评价和划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庸俗性，这是科学的，但有时也会否定一些正确的见解。“所以单凭劳动价值理论来评判和取舍，今天看来难能全面，要适当兼顾生产要素理论”。

晏智杰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这个原理是有条件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势必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导致偏差。

与劳动价值理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分配理论和剥削问题。在不否定按劳分配的同时，理论界更多地探讨按要素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中，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是不能参与收益分配的。若参与分配，资本获得的利润，土地获得的地租，都是剥削收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要素收入不断出现，数量不断增加。如何对此做出经济理论上的解释？胡培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出资人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首先是资产受益权。这是天下皆然，名正言顺的公理”，“价值固然是职工（包括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的劳动创造的，可是，单有劳动没有其他客体条件的辅助，赤手空拳是绝对创造不出任何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些客体条件不创造价值，但参加价值生产，对价值创造是有贡献的”。魏民发表了论文《关于按要素分配的理论思考》，对目前学术界有关分配问题的争论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结构、政府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理论有所进展。

总之，1999 年是政治经济学孕育理论冲动的一年，经济学界普遍感到回归基本理论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做出了初步的努力。

二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1999年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面对过去所没有遇到的新变化、新问题，研究活动活跃，在一些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注重体制分析

由张曙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发表论文《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从体制变化的角度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及宏观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改革以来，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波动关联强度很高，相关系数高达 79.5%，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规模由国家控制，起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但是，1998 年国家采取大规模扩张投资未能起到刺激经济的明显作用，主要原因：一是国有投资扩张没有使非国有投资跟进上来，制度上没有为非国有部门创造出良好的预期发展空间；二是国有投资效率低，国有企业不良负债增高，造成国家财政借债负担增大，财政能力减弱；三是为防范风险采取的一些体制调整措施，产生出紧缩负效应，抵消了宏观政策工具的扩张效应。体制的市场化推进和逆市场化倒退都可能产生收缩效应，该文着重分析了逆市场化倒退的紧缩效应，如，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化措施，使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面临更紧的金融环境；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削弱了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对企业改革形成新的障碍；体制收缩性措施造成新的扭曲，侵害市场效率，降低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

这篇论文着重关注宏观经济下滑及其难以启动的体制原因，提出“体制性紧缩效应”这一概念，把宏观经济的分析触角伸展到比政策工具更深的体制层次，对与宏观扩张政策工具并存但产生相反作用的体制变化效率做出分析。这篇论文与该课题组近年来连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一样，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注重体制分析。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是否应当包含体制分析，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分析是一种短期分析，只应当包括政策分析，体制变化是长期因素，体制因素在宏观经济短期分析中是不变条件，规范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应包括体制分析。另一种看法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前提条件是经济运行的制度和结构是既定的，这种体制不变的分析框架比较符合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仅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分析，中国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很多宏观政策调整和体制变化紧密相连，在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政府必须采取较强的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体制调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往作为一种力度较强的调控措施起作用，而且，体制变化起着比政策工具更为基本更为深层的影响效应，因此，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深入分析不能不包括体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持后一种看法。这篇论文再次强调了体制分析在宏观分析中的重要性，此次宏观调控中政府采取的一些体制调整措施，和宏观政策工具一样在短期内便产生出很强的影响，同时，改革以来体制的累积性变化，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在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判断时对这种变化必须予以重视。该课题组重视体制分析，其宏观经济分析表现出了较具长度和深度的特色。这篇论文在对宏观扩张政策效果不明显的现象进行分析时，着重强调了逆市场的体制紧缩效应，认为宏观扩张政策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方面出现了市场倒退性变化。这样的分析，在理论逻辑上体现出宏观扩张政策选择与体制变革市场化方向的一致性，表现出了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积极取向。但是，这篇论文的分析也存在着问题，一是认为各种政策工具收效不大的核心问题在于体制，在分析时强调体制因素影响，出现了轻视政策分析的另一种偏向；二是注重分析体制逆市场变化造成的紧缩效应，对市场化推进所造成的紧缩效应不够重视，而实际上市场化改革增强需求约束所造成的紧缩效应可能更强；三是认为投资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把分析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投资变动方面，对影响宏观经济变动的消费需求等因素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周天勇的论文《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在对造成宏观经济下落的体制变化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着重对发展结构变化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改革以来，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银行商业化改革及降低贷款风险的改革，造成间接融资渠道相对缩小；资本市场因风险监管问题难以解决，造成直接融资渠道不能有效拓展，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发生梗阻，导致总需求不足。他认为发展结构变化也是导致总需求萎缩的重要原因。中国近两年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显性化和市场化，制约了在岗职工工资的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迫使企业大规模裁减人员，造成职工就业及收入的不稳定，在岗职工收入预期不明；二元结构转换滞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民收入增加困难，造成农村需求增长速度减慢。发展结构转换，影响收入、储蓄、消费和支出等流程。周天勇分析宏观经济变动，更大程度地超出了宏观政策分析的范围，并且主要关注体制长期变迁和发展长期演变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超出宏观经济短期分析而带有很强的长期分析色彩，他所进行的总需求分析，与规范的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完全不同，更像是一种长期性结构分析。

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发展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体制和发展的长期

变动经 20 年来的演进进入到出现累积性重大变化的阶段，体制转轨和发展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无疑造成巨大影响，体制改革所推进的需求约束增强使市场状态由需求膨胀的卖方市场转变为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发展结构变化中的收入差距拉大造成城镇部分耐用消费品饱和与城乡大面积消费支出能力减弱的结构不平衡，再加上体制和发展方面其他的很多变化造成总需求不足。在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如果把分析眼光仅放在政策范围内，不注意体制和发展的变化影响，有可能导致对中国宏观经济变动原因的错误认识。如有些分析者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过热，认为启动经济没有多大困难，这样的分析判断与经济难以启动的现实差之甚远，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仍停留在经济易于过热的体制不变框架里。注重体制变化和发展变化因素的宏观经济分析，比较符合中国现阶段情况，视野较为开阔，分析较为深入，体现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特色及新的进展。这种注重长期变化因素的宏观经济分析，在方法规范上需要进一步努力。

郑超愚的论文《论中国附加预期和需求的总供给函数》，在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与长期结构分析的结合方面做了形式化工作。他在采用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的基础上，尝试建立包含长期结构变化的需求供给效应模型。中国宏观经济变动是复合型的，包括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即与短期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政策调整相联系的短期问题，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发展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相联系的长期问题。1997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停滞受长期性结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既重视短期需求管理又注意长期结构调整。这篇论文在宏观经济的规范分析方面做出了努力。

（二）关于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自 1997 年起出现下滑的同时，出现了商品零售价格持续下降的现象。它使经济下滑问题加重，启动更加困难。宏观经济研究学者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以及通货紧缩的定义、特征、原因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胡鞍钢在 1998 年初写出的讨论性论文及后来正式发表的论文《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中指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他认为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价格指数低于 1%即为通货紧缩的定义，中国 1997 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到 0.8%，表明已开始出现通货紧缩，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到 -2.6%，通货紧缩已经发展到十分明显的程度。

对通货紧缩问题的很多讨论，围绕在通货紧缩的定义及度量上。胡鞍钢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定义正好相反，是指货物与服务的货币价格

的普遍不断下降，只要价格出现普遍不断下降，不论是否出现经济衰退，都是发生了通货紧缩。很多学者不同意单纯以普遍持续的价格下降来定义通货紧缩，认为判断通货紧缩还应当观察货币流通量是否下降、有效需求是否减弱、失业是否增加、经济是否衰退等伴随因素。从讨论情况来看，用多因素把握通货紧缩，可较好地将历史事实与当前情况进行比较，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论文《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考察了历史上美、英、法、德发生的通货紧缩。有些时期，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同时经济繁荣，增长势头良好，这种情况不能说是出现了通货紧缩。只有出现价格下降伴随以经济衰退现象时，才可判定为发生了通货紧缩。从中国经济目前情况看，在价格持续下降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市场需求减缓，企业经营困难，不良债务增多，下岗失业增多等现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

学者对通货紧缩发生的原因、作用机理及其政策措施进行了探讨。谢平和沈炳熙的论文《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分析了通货紧缩发生的国内外原因，从国际原因看，存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深刻背景，世界经济下滑，价格下跌，金融动荡，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产生输入性通货紧缩的影响；从国内原因看，一是传统产业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低下并存，一方面传统产品价格下跌不止，另一方面缺乏带动价格回升的高新技术产品；二是货币供应量增幅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广义货币 M2 增长率高于 GDP 增长率的差距幅度从 1993 年的 23.8 个百分点缩小到 1998 年的 7.5 个百分点；三是存款超常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相对缓慢，新增货币供应量中的很大部分未形成新的市场需求；四是宏观政策调整滞后，在 1998 年初已经出现明显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仍然是反通货膨胀而不是反通货紧缩，影响了对通货紧缩的抑制和治理。余永定的论文《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根据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原理分析了通货紧缩对宏观经济造成损害的作用机理，物价持续下跌，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工人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减少，居民消费需求减少，总需求下降导致物价水平进一步下降，并导致企业亏损进一步恶化及总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形成物价持续下降与总需求和总供给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学者建议，治理通货紧缩应当成为当前宏观政策及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三）经济难以启动的原因及政策选择

1998 年中央政府针对经济下滑，采取了启动内需的扩张政策，但效果不明显。对此，学术界有多种观点。王洛林、刘树成、刘溶沧合写的论文

《论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归纳出几种见解。①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经济下滑。低水平重复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造成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创造不出新的需求，因而经济增长缓慢（张健）。②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已由供给短缺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何德旭、王维安）。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消费需求。高收入人群数量少，低收入人群数量巨大，还处在温饱不足或仅够温饱的水平，消费需求停滞于低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董辅礽、赵京兴）。④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体制和政策制约消费结构升级。城市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的百元、千元消费向“住、行”的数万元以上消费升级的阶段，但社会保障、消费信贷制度和政策未提供推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⑤信贷萎缩导致社会投资不足。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撑着 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1998 年非国有中小企业投资几乎没有增长，所能获得的贷款减少，重要原因是缺乏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及对非国有部门的金融歧视政策（樊纲）。

王洛林等人认为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大幅度下降。根据统计数据，发现 1981 年以来最终消费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94、1995、1996 年降低到 5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近几年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虽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却对应着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按不变价计算，最终消费率是下降的，资本形成率是上升的；按当年价计算时，最终消费率是上升的，资本形成率是下降的，当年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最终消费率下降的问题。最终消费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资本形成率高，二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预期支出大幅度增加，导致强制储蓄增加。为解决最终消费率过低所导致的经济下滑问题，启动经济的政策措施，应当从扩大国家投资转向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

三　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企业产权理论

张维迎和马捷研究了中国发生的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在政府任命的厂长经理手中，而这些厂长经理在企业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大于他们在企业成本中承担的比例，更一般地说，厂长经理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称，这就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的出现，导致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国有企业竞相压价，导致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恶性竞争状况。

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作为个人来讲，其承担的边际成本远远小于生产的真实边际成本，因此，经营者追求个人目标最大化与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发生了严重偏离，满足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的价格就可能低于真实的边际成本，因而经营者“负盈不负亏”的程度愈大，其越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他们通过静态的博弈论模型，证明了恶性竞争的存在性，证明了国有行业中企业数目越多，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同时，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恶性竞争的可能性越大。这就意味着，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一定意味着恶性竞争，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

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在拥有企业权利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不必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而只是把国有企业作为实现自己目标最大化的工具。国有企业经营者在定价时，不仅面临技术约束（由成本函数表示）和消费者行为约束（由需求函数表示），而且，他们还面临着产权约束，这种约束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者是以虚拟的需求曲线为基础来定价的，而不是以实际的需求曲线为基础定价的。产权约束使得消费者行为约束弱化，消费者行为约束是“软约束”。但是，产权约束并不会弱化技术约束，这是硬约束。所以，不难想像，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程度越大，技术越落后，恶性竞争定价就越可能发生。

（二）关于信息经济学

在信息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究竟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特点呢？谢康、陈禹和乌家培根据对国内外的一系列文献和资料的研究，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工业社会时代企业的固定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40～60％，其他为可变成本。而在信息时代，企业的固定成本几乎占总成本的 99％，可变成本约为 1％。这是因为信息商品成本与使用规模无关，信息技术使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根据他们的研究，企业边际成本的递减可以同时出现在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三个领域中。在企业生产领域，信息技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相对降低劳动的单位成本。根据 1998 年的调查，深圳市建筑、机械和纺织等传统企业中多数企业采用计算机技术后，高度重复性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15 倍，标准化作业的效率提高了 5 倍，通用典型化工作的效率提高了 2 倍，专用和开发性设计分析的效率提高 1 倍以上。在管理领域，企业管理成本的降低最明显地体现在库存成本的降低。在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应用的示范工程中，各个企业的库存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 10％到 20％不等。信息化使得企业在风险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较之信息化前减少了库存量。

更重要的是，信息化带来了企业交易成本的下降。一方面，信息技术减少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环节，特别是使用了网络技术后，企业可以较好地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缩短顾客选购商品与商店补充货源之间的时间差。一般来说，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的公司一般可以节省 5～10％的采购成本。信息技术不仅降低了企业内部活动的交易成本，而且还降低了企业与外部 市场活动之间的交易成本。互联网方式的交易成本比传统的通讯方式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且这种优势随着地域的扩散而增强。

9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竞争的交易成本。电子商务具有一次性投入（固定成本）高，可变成本低廉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那些交易量特别大的企业和公司更易于获得收益，因而更易于获得竞争优势。此外，信息技术还改变了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模式，企业更多地根据消费者需求弹性确定价格，因而由边际定价转为弹性定价。

企业成本的相对收缩结果带来了企业最优边界的相对扩张。由于企业能够以低信息成本实现共享管理成本，因而能够随着规模扩大而降低边际管理成本，这就导致企业最优边界的扩大。按照科斯的观点，随着企业内部交易的增加，管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因而企业的规模或最优边界受到限制。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企业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提高内部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提高企业内部每个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因而可能扩大企业的最优边界。

（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张春霖描述了国有企业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调整和改革取向，他指出这种调整是一种必然趋势，即无论意识形态还是政府政策都无法阻挡的趋势。由于国家办企业必须承诺支付工人的工资，给债权人还本付息，给供货商付货款，等等，这就形成了对于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基本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和其他因素促成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被动调整。这样的被动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一部分私人储蓄脱离了国家控制，成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国家面临资金限制而在某些行业无法继续投资，因而相对比重不断下降。②国有企业负债率大幅度上升，大批国有企业被“非资本化”，在这类企业中，债务增加如不能伴随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就无法持续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融资。况且，随着债务的累积效益的下降，原有的所有者权益被资产损失和亏损所侵蚀，逐步化为乌有，实际上国家在这些企业中除了历史欠账已经无可“所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企业在被“非资本化”的同时也已经被“非国有化”。③部分国有企业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借助非国有资本进行资本化，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引入非国有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权投资，主要采取与外商和港澳台合资以及股票上市的途径，来吸引国内外的私人投资，国有企业因而转化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④部分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清算退出了市场，至少，从 1994 年至 1998 年，政府组织的试点中已有 2336 家国有企业破产。

除了上述被动调整，政府还进行了一些主动调整。主动调整的关键在于如何退出、退出的通道和政策措施。大体来说，国有企业可以从 4 条通道退出：股权转让通道，主要适用于企业的净资产为正值的国有企业；债转股通道，首先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出售，然后实行债权转股权，再将股权出售，主要适用于资产价值为正值或零的企业，但是尚有挽救价值，值得重组的企业；资本化通道，吸收非国有投资者的投资，降低国有股权比例，直至使国家退居财务投资者的地位，将控制权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清算通道，对那些资产价值为负值，没有挽救价值，失去生命力的国有企业实行破产清算，资产变现，关门走人。

张春霖认为，问题最复杂的是国有大型优势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他提出，在这类企业中私人产权并不一定能引致经济效率，根据俄国和东欧的经验，剩余索取权的私有化是很容易的，但是，真正决定企业效率提高的是剩余控制权的私有化，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有能力从国家手中接管剩余控制权的主体十分稀缺。国内的私人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管理层能接管剩余控制权，也可能会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代价是十分昂贵的，这可能会使改革在政治上令公众无法接受。其次，国外大公司接管剩余控制权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它往往会使国家和民族无法承受，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能是为了避开上述两种选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机构投资者，如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在不破坏财富分配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必要的股权集中，以便能够从国家手中接管剩余控制权。东欧等国家正在进行投资基金的尝试，不过其投资基金基本上是一种重组基金，把企业重组之后再卖掉，并不打算长期持有企业控制性的股权，因而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或许，机构投资者只有成为具有长期发展目标的战略投资者，对于产权问题的解决才具有关键意义。

可能是由于中国缺少这样的战略投资者的缘故，所以张春霖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约束不在产权，而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因此，至少在近期，中国没有必要对国有大型优势企业的控制权做大规模的变动，而把重点放在已经非国有化的企业和中小企业上。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制度环境的建设问题和其他各类企业的发展问题，再回过头来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环境和约束条件就会大大改善。

（四）关于企业“债转股”问题

国有企业的亏损累累和高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银行不良资产，是促使政府出台债转股的基本动因。此项政策出台的理论基础和背景，以及可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朱民和黄金老的文章对此加以详尽论证。

他们提出，债转股问题实际上是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通过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分离银行的不良资产，以便化解金融危机可能产生的根源。在中国，这种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可以用于解决银行的问题，还成为解决国有企业困境的途径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债转股的最大期望是花钱买个新机制。资产管理公司的出台带来了改变企业控制权的极好机会。资产管理公司必须确保不良资产投资者有改组债务企业管理层的权力。通过国内或国际范围的招标，对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资本化，把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战略性投资者手中。不过，在实际中，许多国有企业把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又当成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尽可能地把债务推到其下，赖账不还。这种情形是有先例的， 1994 年创设政策性银行时，其被定性为非盈利性质的金融机构。结果，政策性银行被普遍理解为第二财政，3 家政策性银行运行不到 5 年就积累了 3000 亿元的不良资产。

总之，债转股的政策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理论是以纯粹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条件下，很难取得成功。为此，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种方式的趋势不是导致国有企业的退出，而是为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率生存创造条件。

（五）关于国有企业资产定价问题

在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时的“低价”转让现象屡见不鲜，已经成为阻碍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根本障碍，它造成了大量国有企业无法通过市场进行必要的产权让渡，形成了产权改革的僵局。如何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和原因，杨丹的文章提供了相应的说明和论证。他提出，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过程中，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德国，普遍存在价格低于评估价值的问题。 1989 年两德统一后，成立了托管局，并组织专家对全部国有资产进行认真评估，评估价值约为 7000 亿马克。但是到 1992 年私有化高潮时，所有的投资者认为全部资产最多值一亿马克，最后的实际拍卖价与此数极为相近。把资产转让低价归结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等等，很难解释为何在以廉政著称的德国会出现这种现象。杨丹试图通过分析卖方和买方的行为，来给出一个市场化的合理解释。

杨丹认为，中国评估行业用于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主要有 4 种：①重置成本法，由于其数据较易收集，故采用频率较高，这也是其价格的最大

可能值；②市价对比法，选择一个或几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资产作为参照物，再适当调整，得到评估价值；③收益现值法，其主要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益和折现率，从理论上讲，这一方法对于买卖双方都适用；④清算价格法，要求在短期内变现所有资产，出售者是在非自愿或被迫处置资产的情况下出售资产。总之，重置成本法评估得出的是卖方可能的最高售价，一般应用于有多数买者竞争时的价格确定；现行市价法需要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有较多的买卖者平等竞价；收益现值法评估的是卖方在不急于变现的前提下，资产最低的可接受价格，它要求卖方有较长的搜寻时间和较大的搜索范围，以便找到足够数量的买者。这三种方法均为卖方的价格，而当买方占了主动，就应适用清算价格法。

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当政府规定了卖方不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原则上转让价格不应低于评估价值的前提下，政府的要价成为一厢情愿的“准计划价格”，此时的每类资产的供给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完全缺少弹性，这是产权市场有行无市，难以成交的主要原因。

此外，杨丹根据威廉姆斯等人的研究，提出在现实交易中，资产专用性越强，就要求越多的搜寻强度，以便找到资产的最佳使用者，这意味着高昂的搜寻成本。在搜寻范围较小的条件下，价格只能由买方出价决定。对于买方而言，未来收益现值法给出了需求价格的确定方法，这是其最高的愿支付价格，只有转让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买方才是有利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评价不同，因而买方出价不同于评估价值是不足为奇的。判断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存在流失的标准不在于成交价格是否低于评估价值，而在于转让是否符合市场竞价原则。只要符合市场竞价规则，那么就是合理的行为。

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论著，这些论著不乏真知灼见，澄清或更正了一些已经流行的模糊认识和谬传。现就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0年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时间距今比较远，实施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长期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

来，造成理论界、学术界对此讳莫如深，以至许多人对此不甚了了。说起经济体制，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经济恢复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直接来自于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据地经济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独创的全新的经济学说。据此理论，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而近年来的经济改革进一步证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事隔 40 余年，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仍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近两年来，关于这个问题在部分著作中有以下观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作用　　王东提出：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头 8 年，虽然党从 1953 年起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实际上仍有重大影响。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我们创造了扎根中国国情、富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新型精神文明，集中表现为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他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概括为“本质上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管理下的新型市场经济”，总体格局为“新型市场经济 + 新型民主政治 + 新型科学文化”的三者统一；在体制建构与经济发展上，有新颖独特的五大创造：①建构保持 5 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而总体上又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②新民主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体系，从微观机制角度看市场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国民经济总体又有一定计划性；③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便调节内部矛盾，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④灵活多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以便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发展一利用一限制一改造”四个方面协调一致的经济机制；⑤自主自愿、循序渐进的农业互助合作，以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他认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等历史盛况的成因最本质之处，绝不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后来照搬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也不是我们受前苏联模式影响，过急、过快地推进了三大改造，而在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主导思想，创造了富于生机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新型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　胡绳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

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胡绳不同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如何、为何转变为单一的计划经济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为何过早结束，学界的看法颇多，角度不一，但是初步改变了以往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体制与理论不完善的看法，并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赵凌云认为，1949～1952 年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为市场体制因素与计划体制因素并存，两者在相互补充的同时，出现相互冲突，计划体制作用的广度、深度日益加大，市场因素日益萎缩，市场化进程式微。1953～1956 年形成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市场化走向中止。市场化进程的中断，切断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的联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联系，为“三大改造”急速推进创造了条件。市场化进程中断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早结束的深层原因。武力提出转变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四面八方”政策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些不相适应；苏联不容忍中国长期保持这种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当时很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戴光前指出，建国前后的构想是先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种“先后战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并举战略”，这样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看做过渡期。

（二）50～70 年代中国的经济与经济体制

50～70 年代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与实施的时期。1978 年以来，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从推进改革开放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侧重于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对这个时期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与客观。特别是在纪念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许多文章与著作在肯定后 20 年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前 30 年与后 20 年的关联，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但是，其间也不乏交锋与对立。

1．关于 50～70 年代的发展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

1996 年 11 月 8 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错误选择证明，思维落后势必影响决策的科学化》一文。该文认为，建国

初期不应该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因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还需要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以及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当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是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的。作者的结论为：“在当时情况下，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就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并认为搞唯意志论的原因是“我国社会科学落后，理论思维不够发达”，在决策上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缺乏反复论证。“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犯原则错误，恐怕正是思维落后造成的一大苦果”。

胡嫩仁反驳了上述观点。他引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谈的史实和观点指出，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已经为百多年的痛苦经验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脱离了国情，搞了唯意志论”的问题。发展重工业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的必然。他认为指责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吕政则充分肯定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认为：事实证明，建国初期，选择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方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正确的。这种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在较短的时期内奠定了重化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应该因现在需要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而否定建国初期历史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2. 关于“一五”建设

董志凯首次全面阐述了“156项”建设项目立项的历史经过、项目内容、名称、变化、投资规模、开工竣工时间和产出状况等，并指出：“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的时间中，一方面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在利用苏联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为了提高建设效益，国家有关部门从1950年至1955年进行了大量调查、勘查勘测、综合配套、反复比较等研究工作。经过多次调整修订，方最后落实项目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多次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调整，从而为项目的高效建设与投产奠定了基础。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是指在资本主义封锁的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